



中国 馆配

●数字
4.1亿美元

国际著名的图书馆电子书、有声读物和流媒体平台 OverDrive 在2015年3月宣布,其被日本乐天株式会社以 4.1亿美元的价格以现金方式收购,交易将在4月完成,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之一。Insight 风险投资公司是 OverDrive 自2010年以来最大的股东。OverDrive 将作为乐天株式会社美国公司的子公司运作,并和其他乐天子公司紧密合作。乐天把数字化内容和电子商务、金融视为全球增长的三大支柱,2012年以来,被福布斯杂志列为世界“最具创新性公司前20名”。OverDrive 的现任首席执行官 Steve Potash 将继续领导该公司,他在发言中表示,期望和乐天公司紧密合作迈向互利的未来。这次收购代表了乐天在电子书市场的战略性扩张,乐天提供电子书阅读的 Kobo, 将和 OverDrive 一起提供世界范围的数字内容传递和阅读服务。(丁培等编译)

●观点

古籍出版不易,古籍数字化更不易

■洪涛(中华书局古籍资源部主任)
古籍蕴含了广袤无垠的知识和智慧。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时代曾经到达的智慧高度,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载而不断的重要原因。但要把他们古为今用,就必须进行古籍整理,这是一个非常艰辛和繁杂的过程,它有着许多规范的工序和方法。

一般古籍整理的工序和方法有:选择底本、影印、校勘、标点、注释、索引、序跋和附录等,经过这些工序才能保证做好完整版的古籍整理本。目前由中华书局等30余家出版社组成的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简称古联体),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主力军。另外,部分中央和地方综合出版社、教育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也承担了部分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可以说,近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成绩显著,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总体出版能力增强。

一直以来,为积极应对新形势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各出版社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古籍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古籍数字化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代表着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虽说技术水平、资金投入、赢利模式、版权保护等方面的困难限制了出版业对古籍资源进行数字化的商业开掘,但古籍数字化仍有不少先行者。这里所说的“古籍数字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保存和传播。

目前已经有一些大规模、有代表性的古籍数据库陆续投入使用,国家财政也对不少项目进行资助补贴。但存在的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有以下四点。第一,缺乏统一规划、内容重复建设严重。比如一套《四库全书》,先后有三家制作单位对其进行过数字化,这种重复在人力和财力上都是一种浪费,它提高了开发成本,相应减少了对其他可开发项目的投入。其实这样的重复建设不仅体现在古籍数字化上,不少古籍出版物也存在此类现象,被用户诟病。

第二,知识产权解决困难。经过专家整理的古籍是具有版权的,一部分单位为了规避版权风险,只能使用版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抄本刻本古籍,没有任何专家校勘、标点、注释的内容,既不利于使用,也存在许多错误,很不严谨。还有一部分单位铤而走险,侵犯版权,这些都会给使用单位带来法律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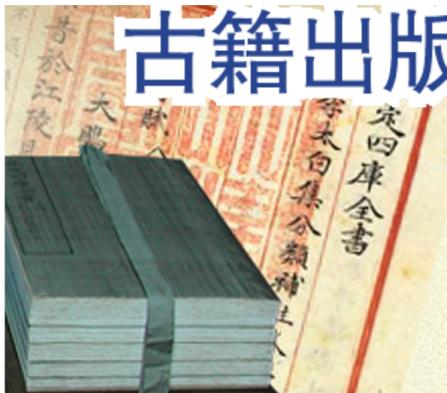
第三,古籍疑难用字的解决不理想。业内使用的大多是国际标准的 unicode 字符集,但目前该字符集仅涵盖7万多汉字,这在古籍的数字化中是非常不够用的,所有这之外的字都需要靠造字解决。有些公司为了简化手续,仅仅是对这些集外字以贴图的方式处理,虽然保持了古籍用字的原貌,但失去了检索功能。古籍中还有大量异体字、通假字、避讳字,这些都给检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系统虽然附带了繁简异体字的关联检索,但是脱漏甚多。可见如果没有专门的编辑或者研究力量支撑,数字化古籍用字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第四,阅读支撑体系不足,对现在的读者而言,古籍无疑是非常难读的。不仅是字词难于理解,还有很多专业知识都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比如古代的纪年方式与公元纪年的对照,古代人名的不同表述方式等等,这些都是今人在阅读古籍时所必备的知识。但是目前的古籍数字化系统通常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简单的联机字典和公元纪年对照表,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此外,目前古籍数字化多为封闭式建设模式,缺乏统一标准、阻碍资源共享。数据库在著录格式、数据格式、文字编码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且互不开放,无法在统一平台集成使用和共享。

古籍出版不易,古籍数字化更不易。规范化建设能推动古籍资源库在数据采集、加工等各环节走上科学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推动共建共享,还能促进其快速、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反对古籍整理出版进行规范,古籍数字化更应同样对待。

●观察



古籍出版:如何透过喧嚣发现机遇?

4月9日到10日,2015年江苏地区古籍大型文献交流研讨会暨江苏省文献资源建设业务交流会在东南大学图书馆举办,来自江苏50余家市地级馆和中等以上层次高校馆的70余位代表、15家出版商和机构代表出席并发言。社馆代表分别就各自的出版动态和各馆的馆藏重点进行了沟通。这次馆社店交流,也让我们为看清当下的古籍出版热提供一些依据。

不过,伴随公共图书馆经费的增加和图书馆对精品馆藏的偏爱,这两年古籍出版在图书馆倒很是风光,不少古籍社的大型文献销售码洋呈两位数增长,有的甚至在当年秋天就能完成一年的销售额。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采访了到会的多位古籍社社长,他们却在不同程度上对当下的古籍出版热打了问号、泼了冷水。首先,他们认为,古籍出版从来就不是一个热闹的行业。广陵书社副社长孙叶锋说,仅就市场体量而言,古籍社在国内出版业界几乎微乎其微。目前的古籍出版业,远达不到繁荣的程度。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有政府财力支撑的馆配市场,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办馆配会,众人趋之若鹜,出版社发行人疲于奔命,这本来不是一个常态的市场模式。其次,市场浮躁同时带来的是人才的缺乏和古籍出版的良莠不齐。凤凰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姜小青提出,古籍出版热闹是件好事,但不少完全从经济利益出发,这就难免出现质量问题。真正潜心于中国传统典籍,需要很大的献身精神。在这样的喧嚣中,人才是个大问题,因为古籍整理和出版是有门槛的。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预测,由于专业人才缺乏,因此若干年内,艺术文献的整理出版将会出现良莠不齐的局面,前景并不乐观。再次,古籍社虽说这几年增量平稳,仍急需在大众市场寻求突破。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王淳持有此观点,这也是对当前不少古籍出版物印数下降,定价上升的应对之策。此外,古籍社的增量常有赖于新品的不断推出,这就需要出版社在传统的古籍整理以外,注重集成性文献的策划出版。

三方一碰头,这事儿成了

他们要办一场接地气的民间馆社店交流活动。

4月9日,南京的初春并不温暖,但东南大学图书馆采编部主任邵理家,以充满热情的主持,激发在场的出版人和图书馆人进行交流和观点交锋,畅所欲言、氛围热烈。

最初,建有南京当地图书馆采编QQ群的邵理家只想办个图书馆采编交流会。恰好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市场企划部主任查明昊和凤凰书城的黄磊,希望与江苏图书馆采访馆员就古籍文献资源建设工作进行馆社三方交流,一碰头,这事儿成了。

受邀参会的图书馆人来得很整齐,几乎是各馆的采编部主任或采编主力,东道主东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爱国作了致辞。但也有参展商嫌论坛规格不够高,没几位馆长参加;相反,多家出版社社长到会,很是重视。但邵理家说,他们就是要办一场接地气的民间馆社店交流活动,以草根之力,润润馆社关系,并促进图书馆人的采访交流和提升。

出版社追着图书馆跑,图书馆追着读者跑,纸质资源建设这些年来在图书馆的地位,随读者的抛弃而逐年降低,尤其高校馆,纸本图书的利用率大幅下降,期刊阅览室成了自修室,许多馆长开始发愁起了借阅率和到馆率。随着纸质资源的使用率不断降低,中文纸质采访经费也在逐年降低,利用率更高的电子资源经费则逐年增长。虽说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建设和服务的基础,但近年来,馆长们更注重图书馆的创新服务,比如不仅增加电子资源经费,实力雄厚的还要上资源发现系统,对一些自助借还设备、读报系统、触摸服务、移动阅读、RFID等热态度,大幅上升。

古籍社社长为古籍出版热打问号

一方面古籍在图书馆得到青睐,另一方面古籍社社长们却不同程度地对古籍出版热提出看法。

●古籍出版案例

帮助中华文化“走回来”

古籍出版有多种出版模式,第一种是寻求政府资助和扶持;第二种是主打定制出版,开发实用性强的产品;第三种则与海内外图书馆合作,帮助整理馆藏的同时加以出版发现。

这些年来,作为我国最早到海外寻访中文文献的出版社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直致力于中华文化的“走回来”。从1999年起至今,他们始终在寻访并通过影印的方式,回流中华文化,促进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虽不是专业古籍社,但在文献档案的出版上,已颇有名气。他们不仅做得早,起点也高,首家合作的海外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所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曾获得第14届中国图书奖。目前,该社今年重点推荐《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稿抄校本汇刊续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抄本汇刊》、《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等大中型文献图书。

广西师大社文献图书出版分社社长雷回兴介绍说,一直以来,该社的文献类图书出版宗旨是服务学术。譬如2004年出版的“满铁密档满铁机构”,这些档案是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证,多年来知之者甚少,研究者更是寥寥,但这样的书哪怕亏钱也要出。随着工作的深入,目前已有固定联系人负责海外文献的联络和出版事务。她希望通过敬业和专业,让更多的海外图书馆人了解中国出版人。在她看来,挑选海外文献出版并非难题,按照自己的出版宗旨挑选便是了。

在被问及“目前从国内到海外寻访古籍的出版社越来越多,竞争是否比过去大?”的问题时,她也看得淡然,因为他们的宗旨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学术服务,只要东西能回到中国,就很欣慰。

●馆长问答

从2014年5月上任至今,从学者到图书馆人,董群有哪些思考,“专家治馆”又为金陵图书馆带来哪些活力呢?4月9日,本报记者对董群进行了一次漫谈式专访。

董群:馆长无常心,以读者之心为心

■受访人:董群(金陵图书馆馆长) □采访人:夜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一年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董群受聘兼任担任金陵图书馆馆长,同时担任“南京历史文化遗产与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一职。聘任专家学者担任南京市市属文化单位负责人是该市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探索和创新,与他同时到任的,还有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波,二人分别受聘兼任六朝博物馆和江宁织造博物馆馆长。这项改革在当时很火了一把,这样的任命,是对深藏书斋的学者如何与城市的文化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让城市更好地以文“化”人的一次革命性的探索。

在采访董群之前,我读过该馆馆刊《阅微》对他的一篇采访,他将佛教文化的基本观念以及与人生活的关联娓娓道来。其中一些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认为对人生悲观、消极的结论,都不是佛教文化的真正的人生精神,一旦了解生命的有限性,更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加紧修行,要精勤进取。因为我们每一代人对社会的奉献、创造,对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对社会不完善之处的改造都是在为下一代人的良好空间打下基础。

带着这样的印象,本报记者近期走访了金陵图书馆。有文化绿洲和大众课堂之称的金陵图书馆创立于1927年,曾荣获“群星奖”这一文化服务领域政府最高奖。该馆位于南京河西新城,“琢石成玉”的设计,让图书馆看上去像一块悬浮于草坪之上的玉石。阳光从主楼透明的圆形天井顶棚中撒下,一颗硕大的“水滴”悬挂在大厅中央的巨石上方,寄托“水滴石穿”的寓意,并呼应南京的雨花石传说。从二楼书畔苑往外望,盈盈绿地和一池春色尽现眼前,真真是读书的绝佳之所。就在这里,佩戴着金陵图书馆工号“001”的馆长董群带着笑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



董群 佛教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东南大学金陵图书馆馆长(兼)、东南大学

□您怎么看“学者治馆”这样的说法?

■也许有人认为,学者只懂做学问,可能不懂管理;不懂管理却来治馆,这不是矛盾吗?所以,这个提法,也许表面上是肯定性的,另一方面又是否定性的,人们往往在肯定一个人某种特长的同时,实际上在暗示其另一种不足。“学者治馆”是一个多角度开放的概念,因此也可以有多元的理解;但这个词对我而言,是个褒义词。专家馆长首先是高校对地方进行的一次智力支援。而且图书馆馆长这个职位,从大文化的角度来看,首先必须是通才,对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常识层面,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又要有所专,你还得讲话有学术的分量,在学界要有影响。我接受这样的褒义性理解中包含的鼓励。

□我看到新闻说,您的聘任采取兼职方式,3年为一任期,主要承担业务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职责;作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还要完成一个以上的重点研究课题。目前您任职已近一年,在金陵图书馆的发展上,您有哪些设想吗?

■我去年第一次来馆跟大家见面时,谈到图书馆人的一些基本理念,我认为图书馆人首先要有奉献精神,只有对图书馆事业所包含的价值有宗教般的信仰,才会对工作报以极大的热情,以真诚服务的态度和人人平等的爱心去服务读者,以及平和看待各种现象。信仰、责任、大爱,再加上专业的能力。图书馆员是一个“奢侈”的岗位,除了这些专业伦理,还要有“资本”超越世俗,比如有认识上的超越性和甚至一定的经济基础。(下转第14版)